

論中共領袖

—對「文化大革命」的反省—

劉 家 駒

I. 前 言

II. 「文革」產生原因之分析

III. 「文革」時期所運用之策略

IV. 對待知識份子的政策

V. 結 論

I. 前 言

今年是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¹⁾ 過去不少的人曾對「文化大革命」給豫各種不同的看法與評價。這篇文章想就「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領袖們所表現的行動與所運用的策略，提供一些分析。

1) 有關「文化大革命」何時開始，有很多不同的說法，司馬長風從中共的歷史演變上，找出了四個綫索：(一)是從毛(澤東)，劉(少奇)鬭爭的起源來看文革，該是始自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之後，對蘇共政策上的分歧；(二)是「文化革命」一詞的出現，該在一九五六年；(三)是一九六二年江青開始鼓動改革京劇以後，紅旗雜誌在一九六四年社論稱：「文化戰綫上的「一大革命」；(四)是從「黨中央文革小組之設立」看文革，時在一九六六年，而司馬長風自己刻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毛澤東授意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毛派公認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槍。(見司馬長風：文革始末(上)，百葉出版社，民國六十五(1976)八月再版：香港，頁11~13.)

而逃來香港的紅衛兵之間，對文革何時開始也有四種意見：(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評海瑞罷官；(二)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在中央內部傳達了「五·十六」通知；(三)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發表文革「十六條」的時條；(四)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聶元梓的大字報發表時開始，因為全國的大字報紛紛上街，人民都動起來了。(見「文革十年來的中國」座談會，七十年代，1977年2月，香港，頁45)。

事實上，「文化大革命」為中國共產黨來說，確是一場大浩劫；同時，也帶來了一個大轉機，究竟這轉機是好是壞，最主要的是要看中共目前及以後的當政者，如何了解「文化大革命」，以及如何面對目前的各種困境。

II. 「文革」產生原因之分析

如果追問何以會產生「文化大革命」，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了解。這裡不妨舉幾種典型的答案。欣賞毛澤東的人，會說這是保持無產階級革命不變質的豪邁主義²⁾；反對中共官僚制度者會說，這是針對腐化了的官僚集團給豫當頭棒喝³⁾；也有人會說，這不斷革命，不斷鬭爭的意識形態，正是共產黨哲學的實踐⁴⁾；更有人說，「文化革命並不是毛澤東和四人幫在睡意朦朧中想當然地號召起來的兜戲行動，它是長期實行高壓政策，把老百姓弄得透不過氣來的一種因果性反應。……老百姓的反應很快，即刻利用了統治者的內部矛盾起來造反了」。⁵⁾還有人說，「文化大革命」乃在於「精簡行政機構，消除重疊現象」。⁶⁾可是，有人就赤裸裸地指出：「發動文革的最初動機：一是毛澤東為了奪回他日益失去的權力；二是為了實現急功近利，殘酷絕倫的空想社會主義，從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開拓出新的模式，樹立其『世界革命』中心的領導地位及其『光輝樣板』。對於毛澤東這樣一個雄才大畧的政治領袖來講，為了實現這兩條，他是不惜一切，置民族和人民於血泊之中來殊死拚搏的。他的膽畧，他的野心，他的不可遏止的唯意志論，遠遠壓倒了理智和良心」。⁷⁾

事實上，以上的典型原因，固然都可以給豫部份的解釋，然而，有一個不可

2) 韓素音著，楊青譯：《早晨的洪流》，序言，香港南粵出版社，1974，頁6。

3) 翟志成：《起來阿，中國的脊梁——中共建國三十年祭》，《中國人月刊》，第十期，1979年11月，香港，頁11。

4) 齊辛：《北京事態分析，七十年代》，第八十二期，1976年11月，頁5。

5) 司馬氏：《如何正確評價文化革命的歷史功過》，《出路月刊》，第二期，1984年10月，香港，頁32。

6) 埃德加·斯諾：《漫長的革命》，香港南粵出版社，1973，頁14。

7) 魯繼人：《從文革到改革：神州二十年滄海桑田》，《明報月刊》，總號241，一九八六年一月，香港，頁43。

忽視的事實是：自從馬列主義傳入中國後，無論思想界，學術界，文藝界以及青年們等，既對國帝國主義之入侵，滿懷怨恨，無能為力；並對當時的中國政府作為感到失望，再對中國的本位文化失却信心，因此相信救中國的唯一的一條路是用西方文化。其時共產主義在第三國際的宣傳與推動下，不僅是一個意識形態或思想體系的問題，簡直是成為一個信仰問題。⁸⁾ 為此，只要馬列主義所主張的一切，大家都奉為圭臬，同時也必須身體力行。

「文化大革命」該是一場權力鬭爭。因此從開始以來，中共的領袖們從來就沒有諱言過要反對「當權派」和向擁有權力者「奪權」。雖然有人解釋這一權力鬭爭，是來自中共不斷鬭爭的特質，使任何人不能採取中立態度。⁹⁾ 我却推崇丁望的看法與分析：

一九六五年冬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和江青的權力和榮耀的標誌。……一九七六年十月事變的發生，顯示中共各政治集團崇尚權力迷戀權力，他們之間的政策分歧和權力衝突，無法緩和；在毛澤東家長式之下，權力的轉移和繼承，不能以和平的會議的方式解決，擺脫不了「槍桿子裏出政權」的格局。……中共黨內既然有路線和權力的衝突，必然就有政治集團的對立。思想·路線·利益·權力與政治集團的形成關係非常密切。……除了考慮思想·路線·利益·權力的因素，還不能完全忽略，人與人之間特殊的交往關係，工作關係。¹⁰⁾

我覺得思想與路線的分歧是不能完全忽視的。究竟誰的思想與路線更為正確，却成了中共領袖人物間，以及派系間彼此攻擊，鬭爭的王牌與工具。同時，很多人相信這些思想與路線的正統·正確性，却是不客忽視的事實。

8) 勞思光：歷史之懲罰，大學生活社，1970年，香港。整部著作除了反省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失敗的原因外，最主要的強調了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相信了馬列主義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既沒有驗證，却變成了純粹的信仰所致。

9) 金思愷：論林彪的權與位，現代雜誌，三卷一期，民國五十六(1967)年一月十六日，香港，頁20。

10) 丁望：政策·權力衝突與政治集團，當代月刊，第一期，1980年9月，香港，頁25。

Ⅲ.「文革」時期所運用之策略

如何貫徹「文化大革命」那就涉及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的性格，作風與方法了。不少的人把「文化大革命」推到「四人幫」身上；也有的修正為「五人幫」。¹¹⁾也有的完全推到毛澤東一人的性格與作風上。誠然，「文化大革命」之浩劫，毛澤東是難辭其咎的。¹²⁾可是，何以偌多的中共上層的領袖們，似乎除了彭德懷之外，不是啞口無言，束手就擒，便是隨波逐流，更有的竟變本加厲，推波興浪，因此，就不能專從共產黨個人性格上去解了。¹³⁾

首先，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最擅長於搞政治運動。在這些不斷掀起的運動中，個人以及個人性格所能發揮的作用，可以說是小之又小，而且整個人都全然投入運動中了。同時，也唯有在政治運動中才能發現個人，肯定個人。這類的政治運動，並不自「文化大革命」產生時開始，而是從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建立政權之前後，就沒有停止過的作風，只不過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是假借名義與藉口；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就名正言順地為革命而永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如土地改革(1950)，三反五反(1951)，肅清反革命運動(1954)，鳴放與整風(1957)，三面紅旗(1958)，以及「文化大革命」(1966～1976)等的各種政治運動。

這裡不妨以劉少奇為例。在「文化大革命」時，劉少奇分別於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和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所做的三次「自我檢查」所涉及的內容。¹⁴⁾似乎都在「群眾組織」的壓力下所做出的坦白。然而，劉少奇

11) 「四人幫」是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五人幫」是加上了毛澤東。

12) 根據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所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十年的文革中毛澤東犯了五大錯語：(一)毛澤東主要論點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及毛澤東思想，觀點左傾；(二)毛澤東主要論點完全錯誤估計當時中國階級形勢及黨國政況；(三)反修說法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上混淆了是非；(四)打擊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誣陷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混淆致我；(五)衝擊黨組織，脫離群眾，不可避免地給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佔去高位，導致內亂；使黨，國家和各族人民遭受嚴重災難。(見翁松燃：有限度的開明，持謹慎的期望—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初評，七十年代，1981年8月，頁11。

13) 司馬長風：中共政權二十年(1949～1969)單頁。實於一九六九年二月，香港。

14) 許冠三：劉少奇與劉少奇路線，中道出版社，1980年，香港，附錄三。

本人却也是強調要組織群眾的。他特別指出：群眾團體是由一群有情感，有欲望，能思想，能行動的人組成的，……只有能使自己變為群眾的一員，能教育，領導，提高其自覺與積極性的人，能幫助群眾解決各種問題的人，才是真正群眾的領導。任何主觀主義的做法必遭慘敗。¹⁵⁾ 所不同的是他反對把所有的群眾組織都政治化。

因此，當鄧小平復出執政後，極力強調不再搞運動・扣帽子・打棍子，可見中國共產黨人也是吃不消的，同時更使人民恐懼。¹⁶⁾

在中國共產黨所搞的政治運動中，有兩個必需的條件：一是要樹立唯一獨尊的權威，企圖來借這一權威發號施令。誠如李一哲大字報所形容的：

獎懶罰勤的突出(空頭)政治，念經式的「天天讀」，越搞越虛偽的「講用」，越鬧越荒謬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鼓勵政治投機的「表忠」，不倫不類的「忠字舞」，不勝煩瑣的忠教禮儀一早祈禱，晚贖罪，集會，集隊，上下交接班，買賣東西，寫信，打電話，甚至吃飯等等，都塗上，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氣氛。總之，讓忠字佔領百分之百的時間，百分之百的空間。……¹⁷⁾

當然並不排除「打着紅旗反紅旗」了。另一條件是：要尋找一個對象，必然先從輿論的揭發隱私上，與造謠污蔑上來下手。例如，為了發動群眾鬭爭劉少奇，不僅指他是極端的個人主義思想與貪污，同時又是叛黨，內奸和工賊¹⁸⁾；對鄧小平列舉了「十大罪狀」，¹⁹⁾ 以及其他被鬭爭的中共領袖們。這為不明真相的群眾們，很容易掀起鬭爭的情緒。同樣，當「四人幫」被推倒後，有關「四人幫」的

15) 同上，頁 94。

16) 遇羅錦說：「從建國以來，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我和我的一家，從『三反五反』，『鎮反』，『反右鬭爭』，『文化大革命』，『反精神污染』，這五大政治運動中，沒有一次躲過，而且必深受其害一關的關，判刑的判刑，死的死，流放的流放，批的批，這其中給我們造成的傷害和懼怕，是無法形容的。憲法，法律雖然都有明文，但從不真正地實行。……今天給我們平反的人，正是過去整過我們的人。……誰能保證搞不起文化大革命，三革命，在這沒有法制的國家裏，就連胡耀邦，趙紫陽也不能說能得住自己的命。……人人沒有安全感。」（見汪衛紅：遇羅錦說是毛澤東「指使」她搞政治庇護，明報月刊，1986年 5月，頁 6。

17) 丁望編：李一哲大字報，明報月刊社，1976年 6月，頁 6。

18) 可參看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平反之文件。

19) 見 1967年 2月 14日「八・二五戰報」。

隱私，又不斷地在報刊上被揭發，以增加群眾對他們的厭棄與仇恨，而無視採來法庭如何對「四人幫」的裁判。這不管是深受鬭爭思想與習慣的影響，與「四人幫」的作風並無二致：

「四人幫」爲了進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同樣乞靈於吹牛撒謊，欺世盜名，他們一開始就死抓住輿論工具，反黨黑秀才專抓輿論，他們控制新聞宣傳陣地，拼湊黑秀才班子，大造反革命輿論，家着馬克思主義的華麗外衣，肆意歪曲和閹割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革命的面目做反革命的文章，顛倒是非，混淆黑白，製造謠言，羅織罪名，亂扣帽子，大舞棍子，打擊別人，擡高自己，擾亂人心，擾亂思想。²⁰⁾

這是在政治運動中，所表現的精神與作風。至於由此而掀起的「批·鬭·改」的行動，却是使人不寒而慄的。

IV. 對待知識份子的政策

有關對知識份子以及對學術思想的政策，中共的領袖們，由於強調一切要爲政治服務，知識份子以及學術思想方面自然也不能例外，這是長久以來的政策，否則的話，一定認爲是反動而加以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時，這方面更變本加厲了。

對學術思想界的人士們，要求他們遵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即無產階級立場），觀點（即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即辯證法）來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如不照這一規定，那就是反動的資產階級的立場，唯心主義的觀點和形而上學的方法，必須加以批判，因此，中國大陸上不但沒有純學術，也沒有什麼學術思想可言。²¹⁾

這種想把學術一元化的企圖，固然是狀害了學術的發展，但在中國共產黨如

20) 文慶：戈培爾的門徒，人民日報，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21) 鍾華敏：一九六六年中共的學術思想批判，祖國，1967年3月1日，香港，友聯研究所，頁15。

此強調意識形態的唯一化上，這是無法避免的。可是，這一學術為政治服務不僅是意識形態的問題，而是誰人來解釋這一意識形態的問題。質言之，這一意識形態的要求，不是客觀的理論，而是主觀的願望和欲求。使到知識份子與學術界，既不能獨立自由，並目更無所適從呢！這方面無論共產黨內外的學術界人士們都無例外。像曾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黨校校長的楊獻珍，由於「一系為二」和，「合二為一」不合乎毛澤東的想法，被批為「親蘇反毛」²²⁾ 中共極有地位的理論家，北京大學哲學教授馮定，寫了「共產主義人生觀」一書，影響青年很大，由於其中關於領袖說：「領袖的作用，總是有一定分量和一定的範圍的，而且不管份量和範圍多大，只要離開群眾，就會寸步難移和一等莫展。……個人崇拜在社會主義社會裡，終久會被克服的」。²³⁾ 中共則認為這是把領袖與群眾對立起來，而受到批判。再如周谷城於一九六二年曾發表過一篇「藝術創造的歷史地位」，是採取馬列主義觀點來立論的，可是，到了一九六四年，竟被指為「明目張膽地反對毛澤東，……竭力想按照自己的主觀世界，提出一條同毛澤東文藝思想相對抗的資產階級文藝路線」。²⁴⁾ 其他如翦伯贊，陳寅恪，陳登原，向達等歷史學家以及侯外廬，馮友蘭等哲學家等都受到了批判。²⁵⁾ 其中特別是馮友蘭吐露出「不堪往事重回顧，四十年間作逆流」的話，可見他真不知如何是好。²⁶⁾

但是，自從吳晗因「海瑞罷官」受到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²⁷⁾ 攻擊

22) 陳風：「一分為二的論戰」與楊獻珍的是非（上，下），祖國，1965年 2月及 3月，香港友聯研究所。

23) 陳風：一九六四年的中共文化工作，祖國，1965年 5月，頁 5。

24) 評周谷城藝術觀的哲學基礎，一九六四年 十五期，紅旗半月刊。

25) 同 21)

26) 拙著：馮友蘭教授咏史詩探微，見歷史與現實，中國學人出版社，香港 1976，頁 43～77。

27) 吳晗的「海瑞罷官」被開刀，原因不少，其中還可以加上吳晗在「關於研究歷史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反對作家不用自己的意見，而以馬列主義思想來代替。這是違反當時中共的政策。見 1967年 4月 26日 南方日報，林遠揮「吳晗在史學領域裏是怎樣同無產階級爭奪年青一代的」中所引。

又關於中共史學一直到「海瑞罷官」的發展，章群在其「中共歷史研究工作的演變與爭論問題」中，有一脈相承分析。見「人物與思想」月刊，第三十五期，香港，1970年 2月 15日，頁 12～16。

後，所有的學術思想，再也不是學術思想，而淪為「含沙影射」，「古為今用」的鬭爭工具。²⁸⁾ 這些都是耳熟能詳，這裡就從略了。

V. 結 論

「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人民來說是一場歷史性的災難；對中國共產黨來說破壞性很大。自從「四人幫」被推翻後，中共所有的改革，絕大多數是從「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影響而來。否則的話，誠如胡耀邦所說的會「亡黨亡國」。

胡耀邦在目前的「整黨」方面的作為，大概是想熱轉「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作風，「先後撤掉了五千多幹部，但我們掌握一條，撤下來後，不降低薪水，不連累子女，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做得合情合理，不影響他們的生活，但不讓他們在工作崗位上繼續為害國家人民」。²⁹⁾ 這只是在策略上的改變，誠如胡啓立所說：「不搞過去那樣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搞那種『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現在這樣處理，他們感到自己確實錯了，而得到的處理可說十分寬大，心裏也有愧」。³⁰⁾ 從這段談話的字裡行間，確實是缺乏法制觀念的，仍然只固於領導者的開明與開恩的觀點。

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的評論是語重心長的，他說：

文革使得全國人民思想混亂，十年動亂，影響了整個一代人的成長。文革之前，每年有十幾萬青年從大學畢業，中學畢業生至少幾十萬。文革十年，就一批紅衛兵瞎搗亂。……粉碎四人幫之後，這情形一時還熱轉不過來。培養人才是長期性的事，破壞十年，恢復至少要二十年。娃娃們習慣了文革時瞎搗亂的風氣。無政府主義猖獗，大家不守紀律，以為標新立異，我行我素就是英雄，誰也不能拿我怎樣，說這是民主·自由。其實不守紀律，沒有節制

28) 可參閱遼耀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風暴中的史學與史學家』及『批孔，中國史學的革命樣板戲』，見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台北，民國六十八(1979)年，頁71~141。

29) 見胡耀邦總書記會見香港明報社長查良鏞先生的談話記錄，明報月刊，一九八五年一月號，單頁。

30) 同上。

的民主，正是破壞民主。文革之前，黨有很大威信，大家信黨，聽黨的話，很守紀律，那時也搞經濟調整，下放二千多萬名青年下鄉，根本沒有問題，黨發出號召，大家就都上山下鄉，只有少數人是例外。但十年文革，不但沒有黨的領導，甚至沒有了黨。³¹⁾

這不啻是對「文化大革命」最嚴厲的批判。惜乎鄧小平只評論了文革的影響與結果，對何以造成文革的最主要的因素並沒有涉及，特別是對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問題，中共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並不能完全使人信服的，特別是對政治現代化上。或許這正是中共領袖們所最缺乏的觀念。

31) 查良鏞：鄧小平的談話記錄，明報月刊，1981年9月號，香港，頁4～5。